

大家进民校

吳彥文編寫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一 热火朝天学文化

随着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，全國人民响应7年内扫除文盲的号召，很快的在全國各地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扫盲运动。單說江苏省，参加业余文化学习的農民就达384万人。各地農村組成了一支強大的扫盲隊伍，青年扫盲隊在各地鄉村中成立。在这些扫盲隊伍中，几乎包括了農村中一切有文化的人，連高小的学生，都積極地参加了扫盲工作。南京市郊棲霞区40多个剛剛摘掉文盲帽子的農民，他們已成為扫盲教师。

在这热火朝天的运动中，光荣的新人新事真是說也說不完。这里，單介紹几个地方的

人民學文化的熱潮。

在南京市，制葯廠職工中的文盲極大部分已參加學習。市郊金星、江東、紅星等30多個農業社的青壯年文盲已全部進民校學文化。仙鶴鄉小張莊出現了夫妻識字小組。白下區的家庭婦女也組織了185個學習小組學習文化。南京電瓷廠工人路愛鳳，是一個60多歲的老女工，她不管下雨路滑，決心到校學習，從不間斷，一年多來，已認識了1,000多字。全國甲等衛生模範魯大媽，經常把“識字課本”帶在身上，有時因開會缺課，就在會議休息時請旁人給她補課，不到一年，就認識了1,000多字。

上海市郊，已有28,800多個農民開始了業餘文化學習。泰興鄉開始“三定”工作以前就把時間作了合理的安排，在“三定”工作的10天期間，羣眾能上課6次，社主任能上課3次。新涇區的掃盲工作開展得又快又好，他們

把这一工作結合了各种中心工作來布置，在一次次的會議上都做了很好的安排。这个区已开办了十多个民校托兒所，解决了有子女的妇女學習的困难。紅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第五分社的青年團員还組織了“青年接送隊”，为子女多的母親接送孩子上托兒所。

江苏射陽，这里民校原來只有434个班，學習小組也只有162个；1955年11、12两个月份却有了大大的开展：民校的班数發展到871个，學習小組發展到499个。原來民校教师只有484人，后来也增加到1,793人（以上統計数字缺一个区）。射海区原來是一个人口分散、从来沒有办过民校的漁民鄉，現在办起了五个班，有學員176人。特別是扫盲計劃有了改進后，學員人数更加增多了。在識字运动中，學員們的學習热情都很高漲。51歲的老學員陸錦錢，借了眼鏡，每晚參加學習，从不間斷。他說：“現在建設社会主义，老年人也要学文化，不然就要落后。”

很快的他已認識100多个字了。

最有趣味的是江苏奉賢。这縣的泰日区泰日鄉3村的文盲参加民校、干部學習班和妇女學習組學習的，已接近100%。大家因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都感到十分快乐，他們寫了250付門对联表示慶祝。另外，他們还紛紛建立了不少俱乐部，組織了剧团、歌詠隊、鑼鼓隊、秧歌隊。一到晚上，人們結束了一天的生產后，大家欢天喜地的到民校学文化。因此这村得到“文化新村”的光荣称号。

二 一些向文化進軍的英雄

在这热火朝天的学文化运动中，祖國各地，湧現了不少学文化的模范人物。这一些人，學習文化是有不同的困难的。有的年紀大了，記憶力不好，眼睛也花了，看書很吃力。有的工作很忙，時間抽不出來。有的家里孩子

多，需要照管，燒菜煮飯，洗衣縫裳，整天忙個不停。可是，俗話說得好：“天下無難事，只要用心人。”他們一下定決心，要摘下“文盲”這一頂帽子，什麼高山大水也阻擋不了他們向文化進軍。他們這種向困難堅苦鬥爭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學習的。

這裡，我們介紹幾位模範人物的事蹟。

我們先來介紹王邦發同志。王邦發是中共南京市棲霞區鄉支部書記，今年43歲。他小時候幫人家放牛，接着就当長工，從沒有進過學校門。參加革命後，因為沒有文化，工作中常感到困難。上級布置工作，記不下來，只有用腦子硬記。遇到文件，自己不認識，只好請別人讀，可是有些文件這樣做又不方便，那就難了。有一次，區里發來通知，要他動員羣眾到某地割草做綠肥，臨到支部給大家打證明信，他沒有法子，只好跑了一里半路到張家庫村，才找到了一個人來幫助打了證明信。

合作化运动加速發展后，他下定决心学文化，抓紧每一分鐘學習。每天除在包教保學時間學習外，还利用一切的時間學習。起牀后学，睡覺前学，會議、工作的空隙時間也学。他把生字塊帶在身上，一有空就拿出來唸。下村工作，走在路上也唸。羣众看他学得入迷，开玩笑說：“当心石头絆跌跤。”但他还是边走边学。

他在學習中碰到不少困难。一开始學習时，不懂學習方法，完全靠死記，寫起來不知从哪里下筆，一个鐘头只能学到8个字，急得滿身大汗。他說过，拿起筆比挑扁担还要吃勁。但是，他并不灰心，却努力找竅門，識一个字，先看清字的样子，比方是草字头还是竹字头，是木字旁还是禾字旁，这样一分清，字就容易記了。有一次，花了50分鐘，認識了57个字。从1955年10月26日开始，到1956年1月14日为止（其中22天，因为教师沒有時間教，沒有認字），59天中，也已抄寫了7本練習簿，

學會了1,125個字。他一邊學，一邊就閱讀了“江蘇農民報”上有關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通俗講話；另外，他寫了黨支部開會的通知，發了兩封信。

王邦發同志談起他學文化的經驗時這樣說：“從我學文化的過程中，深刻体会到不是沒有學習時間，而是沒有決心的問題。過去幾年中就因為我片面強調工作忙，只學到35個字，而現在只59天，就學了1,125個字。只要拿出勁頭來，一定能取得成績。”

我們再來介紹一位8個孩子的媽媽學文化的模範事蹟。有些孩子多的媽媽，對學文化的信心不足。她們總認為孩子多了，牽累就多，時間不夠，心安定不下。其實這些都不成問題，問題還是看你有沒有決心。這位媽媽學文化學得很有成績，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。

這位有着8個孩子的媽媽，名叫曹秀英，是南京市燕子磯區年丰農產社社員，今年36

歲。過去她總是耽心孩子多，學文化有牽累，一次想學，兩次想學，都擱了下來。1955年，她的15歲的女兒曹翠英在高小畢業了，媽媽很高興。她想：“我叫女兒來包教自己學文化，不是很好嗎？”

說了就做。從1955年12月1日起，她開始學文化了，天晴就晚上學，天雨就白天學，每天學1小時左右。按照計劃安排大一些的幾個孩子帶着弟弟妹妹玩，給自己能夠安心來學習。曹秀英還經常把書帶在身上，在挑塘泥休息時，就拿出來復習，一遍又一遍的細看，直到記牢為止。偶然忘記了的字，總是隨時向人問個明白，決不馬虎。從1955年12月1日，到1956年1月初，1月有零的時間，她已認識了160個字。勞動卡上的字，也都認識了。她高興地說：“我一定要好好學習，爭取當一個學習模範。”

我們還要介紹一位耳聾的文盲努力學文

化的故事。

在江苏省常熟縣婁橋區的一個農業社里，有個年輕社員，小時候生過一次重病，耳朵病聾了，因此大家叫他“小聾聾”。他過去沒有唸過書，一字不識。幾年來，生產空隙時，他就叫人家寫幾個字在小本子上來教他。當地人都知道他是个聾子，就用實物來幫助他識字。比如，教他認“燈”字，就一面指指紙上寫的“燈”，一面指指桌上擺的燈，這樣，他便認識了“燈”字。

由於他肯用心學習，隨時請人家教，幾年工夫，他已識得1,000多個字了，相當於一個初小畢業生程度。每天，農業生產合作社里干的活兒，他都能記下來；並且能寫簡單的信。同時，他識了字，能看書，就懂得了不少的新知識。有人在紙上寫了一行字問他：“我們為什麼要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？”他回答得很爽快：“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是走大家富裕的社

会主义道路。”

上面說的3位同志，他們学文化都是有困难的。王邦發同志的工作很忙，曹秀英的孩子多，家事拖住腿，最后一位同志，生理上有缺陷，不用說，學習时有更多的不方便，但是他們都能克服了种种不同的困难，有了很大的進步。沒有这些困难的人，学文化不是更加方便了嗎？只要下定决心，保証学好，找出种种竅門來学，一定会学得好的。

三 几个办好民校的故事

在这次学文化的运动中，各地出現了不少學習模范。这主要原因，固然是由于学文化的人思想觉悟有了提高，懂得学文化的好处，下定决心，勁头十足，但是，民校老师的努力，也起了極大作用的。

怎样办好民校？回答这一句話，要說的自

然很多，民校老師有高度負責的精神，是办好民校的一個重要條件。一個办好民校老師，一個办好民校的幹部，一定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。學的人成績優良，和教的人用心用力是分不開的。

讓我們來听听一個民校的小先生是怎樣教會她媽媽識字的故事吧。

這位小先生叫陳金娣，她是常熟縣慶安小學五年級的学生，又是少先隊副大隊長。她的媽媽是個啞巴，不識字。學校里動員學生幫助農民伯伯識14個字（10個數字，另外還有“月”“日”“工”“分”）的時候，陳金娣像所有同學一樣，響應了這個號召。她回到家里，就做了6套14個字的識字卡，和隊員們一起在新民村幫助農民伯伯學文化。陳金娣教得很熱心，農民伯伯們都很喜歡她，愛同她親近。他們都感激地說：“毛主席教導出來的好孩子，幫我們一羣亮眼啦！”

一天晚上，陈全娣去检查队员的教学情况，队员屈锡庭问她：“你有没有教会你妈妈识字？”这一问，把她难住了。她没有教她妈妈识字呀！可是，这又怎么教呢？她妈妈从小就是个哑巴，耳朵不灵，平常跟她讲话靠打手势，教她识字，困难是太多了。

但是，她想到自己是少先队副队长，在扫盲运动中应该起骨干作用，如果不能克服困难，又怎能推动全体队员呢？想了一阵，她下定决心：一定要在最短期内教会妈妈识字。

起初，她教妈妈识字的办法是：做手势。结果引得她妈妈一面直笑，一面双手像摇糖鼓似的直摇。陈全娣晓得这一条路走不通了，她毫不灰心，开动脑筋，想出了另一个办法：先在字卡上写了个“日”字，然后在纸背面用蜡笔画上个红色圆圈，当作“太阳”；在另一张字卡上写了“月”字，然后在纸背面画上个黄色半圆形，当作“月亮”；就用这看图识字的方

法教她媽媽識字。她指着東方給媽媽看~~圖~~的太陽，然後翻出“日”字給媽媽認，又用同樣的辦法教媽媽認“月”字。啞媽媽認識了“日”字，手指着東方；認識了“月”字，手指着西方；媽媽高興極了，陳全娣更高興。從此，她每逢放學回家，就教啞媽媽識字，用手指1個、2個、3個……教媽媽認識了10個數字。她用拳頭模倣做工人拿鉄鎚打東西的形狀，教“工”字；裝作撥算盤的樣子教“分”字。這樣一次、兩次……反復教了4個晚上，啞媽媽把14個字全認識了。接着陳全娣就把着她媽媽的手教寫字。又經過了一個星期，啞媽媽能寫得出這14個字啦！

陳全娣教媽媽識字的事很快的傳開出去，村上的婦女們都很感動，增加了學文化的信心；同時也鼓舞了慶安小學少先隊員的教學信心，他們決心向陳全娣學習，在7天內又教會了736個農民伯伯識會這14個字。陳全娣

因此得到了青年團常熟縣委的獎狀表揚，并且还光荣地出席了全縣的少先隊代表會議。

陳全娣這種負責的精神和耐心，是值得每一個民校教師和掃盲幹部學習的。啞媽媽還教得會，健全的人不是更容易教會嗎？

其次，要办好民校，解决羣众的实际困难，也是必須注意的。有一些民校，硬性規定了一個學習時間，不去和羣众联系，不知道羣众在学文化方面还有些什么困难，自然也談不到帮他們解决，这样，上民校的人自然就不会普遍，学文化的热潮就掀不起來。泰兴縣封銀鄉大樊堡的吳玉女動員羣众上民校的办法是很好的。这里可以介紹一下。

大樊堡全村共有居民1,075人，其中青、壯年文盲、半文盲有315人。1955年冬季學習，布置到大樊堡后，文教衛生委員會主任吳玉女忙了起來。她挨家逐戶的宣傳学文化的好处，可是，腿跑酸了，嘴說干了，壯年男女还是

來得很少。村里原有兩個民校班，吳玉女想通過這兩班的學員來團結另外一些人，但是不行，有些人只到班上張望一下，就走了。有人買了書，却也不肯來民校學習。吳玉女心里着慌：“人家的民校搞得多好，我們的民校却還沒搞出個名堂來。”

但是，她並不灰心。她決定深入羣眾，懇切地和羣眾談話。從談話中找尋原因。原來羣眾不肯進民校，都是有他們的原因的：有的是說自己年紀大了，還跟十五六歲的姑娘、小伙子一起學習，有點不好意思；有的說早上要拾糞，沒空參加，學了幾個字，丟了一担糞，划不來；有的說小孩多，有牽累，一時一刻丟不下來。吳玉女和村上的知識青年一起研究了這些情況，大家認為這些都是實情，硬性規定時間是不好的。要動員羣眾上民校，一定要不使大家發生困難，一切得適應羣眾的要求，學習的時間地點，不能刻板。因此，他們採取了小組

的形式來進行教學，利用晚飯後、睡覺前，左鄰右舍在一起碰頭的時間，教他們識字。有小孩子的媽媽，可以把孩子帶去。

新辦法試行後，大家都覺得很方便。小組一個個多了起來，從東莊到西莊，一下子出現了7個組，並且各組人數逐漸增加。有小孩子的中年婦女也都紛紛帶了孩子來學習了。

要給羣眾解除學習困難，首先，得深入羣眾，多多和羣眾聯繫，要多聽羣眾的意見。要知道這個人不進民校，究竟是為了什麼原因？那個人進民校後却又有幾天不來上課了，這又是為了什麼？摸清了根子，就要幫助他們解決問題。思想不通的，幫他們打通思想；有困難的，幫他們解除困難。吳玉女動員羣眾上民校的办法，正是很好的說明。

最後，办好民校要能夠得到小學教師的大力幫助。有些民校办得有成績，就是因為得到當地小學老師們的大力幫助的。這是一個